

近代科学社团

与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

范铁权 著

JINDAI KEXUE SHETUAN ■ ■ ■ ■

YU ZHONGGUO DE GONGGONG WEISHENG SHIYE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C13068634

G322.25
07

近代科学社团

与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

范铁权 著

JINDAI KEXUE SHETUAN ■ ■ ■ ■
YU ZHONGGUO DE GONGGONG WEISHENG SHIYE



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航

C1676232

G322.25

07

责任编辑:邵永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科学社团与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范铁权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9
ISBN 978-7-01-012220-5

I. ①近… II. ①范… III. ①社会团体-公共卫生-卫生宣传-研究-中国-近代 IV. ①R193-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21082 号

近代科学社团与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

JINDAI KEXUE SHETUAN YU ZHONGGUO DE GONGGONG WEISHENG SHIYE

范铁权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0

字数:305 千字 印数:0,001-2,000 册

ISBN 978-7-01-012220-5 定价:4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河北大学历史学丛书》出版缘起

河北大学的前身，是成立于1921年的天津工商大学，后改称天津工商学院、津沽大学、天津师范学院、天津师范大学。1960年定名为河北大学，1970年从天津迁至古城保定。河北大学的历史学科，创建于1945年天津工商学院的史地系，侯仁之院士出任首届系主任。聘请齐思和教授讲授中国通史，1946年9月至1948年先后由方豪、王华隆任系主任。1949年1月天津解放，钱君晔任系主任。1952年王仁忱出任系主任。1953年史地系分为历史系和地理系。在20世纪50—60年代，河北大学历史学科以拥有漆侠、李光壁、钱君晔、傅尚文、周庆基、乔明顺、葛鼎华等史学专家，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创办《历史教学》杂志而著称于世。改革开放以来，河北大学历史学科再创佳绩，获得全国第二批、河北省第一个博士点，建成河北省唯一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宋史研究会秘书处挂靠于此，并负责编辑出版《宋史研究通讯》。2005年以来，又获得中国近现代史博士点，建成历史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河北大学历史学科被评定为河北省强势特色学科，2009年1月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成立，本学科获得空前大的支持力度，迎来更新更好的发展机遇。在继续编印《宋史研究论丛》（CSSCI来源集刊）和《宋史研究丛书》的同时，我们决定隆重推出《河北大学历史学丛书》。该丛书编委会成员除河北大学历史学强势特色学科建设领导小组外，主要有：郭东旭、刘敬忠、郑志廷、汪圣铎、张家唐、闫孟祥、刘秋根、刘金柱、吕变庭、杨学新、雷戈、肖爱民、肖红松等先生。

研究历史，教书育人，奉献社会，是我们的天职。

不吝赐教，日新月异，臻于完善，是我们的期待。

最后，衷心感谢各级领导和各位专家对本学科的长期厚爱和支持。特别鸣谢人民出版社对《河北大学历史学丛书》的鼎力襄助。

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
河北大学历史学院
河北大学历史学强势特色学科建设领导小组
组长：姜锡东 成员：王菱菱、范铁权、丁建军

目 录

绪 论	(1)
一、从“卫生”到“公共卫生”	(1)
二、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8)
三、学术史回顾	(11)
四、研究方法	(25)
五、研究思路及篇章结构	(30)
第一章 中西公共卫生之巨大落差	(35)
一、晚清士人眼中的西方卫生	(36)
二、来华西人眼中的中国卫生	(44)
三、“当局者”之观察	(53)
第二章 参与公共卫生的民间科学社团	(57)
一、从中国医务传道会到博医会	(57)
二、戊戌到清末的医学社团	(63)
三、民国时期的医疗卫生社团	(72)
第三章 构建公共卫生知识	(105)
一、何谓“公共卫生”	(105)

二、介绍西方的公共卫生	(110)
三、普及公共卫生常识	(116)
四、倡导环境卫生意识	(120)
五、传播食品卫生理念	(124)
六、阐扬乡村卫生观念	(127)
 第四章 建构传染病常识	(133)
一、传染病及其分类	(133)
二、传染病常识的建构	(139)
 第五章 传播途径与策略	(157)
一、传播途径的多元化	(157)
二、传播策略	(189)
三、卫生运动——多途径、策略的结合	(195)
四、公共卫生与国家政治、民族主义	(204)
 第六章 卫生实践	(211)
一、开展卫生调查	(211)
二、开办医学教育	(214)
三、开办医院、诊所	(226)
 第七章 公共卫生事业中的社团与政府	(239)
一、社团之间	(239)
二、社团与政府关系	(248)
 结 语	(279)
一、积极效果	(279)
二、局限性及其原因	(284)

主要参考文献·····	(293)
一、报刊 ·····	(293)
二、民国书籍 ·····	(295)
三、文集、资料汇编 ·····	(296)
四、著作、论文集 ·····	(299)
五、工具书类 ·····	(304)
六、论文 ·····	(304)
七、学位论文 ·····	(309)
八、外文论著 ·····	(310)
后记·····	(313)

绪 论

公共卫生是通过有组织的活动以保护和增进人群健康的科学和技术,它涵盖预防疾病、促进健康、提高生命质量等所有与公众健康有关的内容,具体涉及公共卫生环境、公共食品卫生、公共饮水卫生、传染病防治诸方面。这是我们今天对公共卫生的一般性理解。早在1920年,美国公共卫生专家、耶鲁大学温斯洛(Winslow)教授是这样定义“公共卫生”的:“公共卫生是防治疾病、延长寿命、改善身体健康和机能的科学和实践。公共卫生通过有组织的社会努力改善环境卫生、控制地区性的疾病、教育人们关于个人卫生的知识、组织医护力量对疾病做出早期诊断和预防治疗,并建立一套社会体制,保障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够享有能够维持身体健康的生活水准”^[1]。他的这一阐释已经非常接近今天之“公共卫生”概念,为欧美各界广泛认可和应用。而在彼时的中华民国,“公共卫生”还是个言人人殊、颇具争议的词汇。那么,“公共卫生”这一中文词汇是何时出现的?其词义经过了怎样的演进历程?欲厘清“公共卫生”一词之来源、词义嬗变及其传衍之始末,首先须从“卫生”谈起。

一、从“卫生”到“公共卫生”

“卫生”一词并非外来词,中国古已有之。《庄子·庚桑楚》一书中提到,“南荣趺曰:‘……若趺之闻大道,譬犹饮药以加病也,趺愿闻卫生之经而已矣’。老子曰:‘卫生之经,能抱一乎?’……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为,

[1] 引自王彦锁、张淑先:《公共卫生概念新思考》,《中华临床与卫生》2004年第4期,第296页。

与物委蛇，而同其波：是卫生之经已”^[1]。此处的卫生，意谓“养生”，即保卫和延续生命。该书很可能为中国目前最早出现“卫生”一词的典籍。此后，“卫生”一词在历朝历代也曾出现过，但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下，其涵义大体不外乎“保卫生命，维护身体健康”，与“健康”、“医疗”、“保健”紧密相关。

随着时代的不断变迁，“卫生”的涵义也在缓慢地发生变化。进入晚清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日益深入，西方“hygiene”（卫生）一词也进入中国。对此，余新忠、杜志章等学者曾专门撰文予以论述。余新忠追溯了“卫生”一词的渊源，阐释了不同朝代对“卫生”词义内涵的构建，揭示出该词汇在传统中国的传衍历程。文章认为，在东亚世界，近代卫生概念首先出现于日本，但却不能简单地把现代汉语中的“卫生”视为一个日源词，它实际是在中国社会近代化的过程中，在西方卫生知识的传入、日本近代的“衛生”用语与卫生制度的引介以及中国士人对传统的重新阐释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逐步、自然形成的。其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化既受日本“卫生”一词的较大影响，又具有相对独立的演变轨迹。在他看来，“卫生”概念的变动，始于光绪年间。甲午战后特别是20世纪初，“卫生”概念变动的潮流开始由暗转明，具有近代意涵的卫生概念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人的著述中^[2]。杜志章则认为，西方卫生学术语“hygiene”传入中国以后，“卫生”的涵义也就开始了现代转化。在他看来，新术语“卫生”引入中国有两种途径：其一，日本途径。19世纪70年代，近代“卫生”语汇由日本明治时期卫生官员长与专斋最先提出，后在日本通行开来。20世纪初，一些留日学者或赴日考察的人士回国后，在介绍日本现代卫生制度及卫生事业的同时，大量翻译日文西著，使“卫生”这一新术语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其二，西方医药卫生书籍的翻译出版。德籍传教士罗存德（W. Lobscheid）编撰的《英华字典》（1866—1869）中将Hygeian art解释为“保身之理，保身之法”。创刊于光绪二年（1876年）的科技杂志《格致汇编》，登载了英国传教士傅兰雅的译文《化学卫生论》、《居

[1] 《庄子全译》，张耿光译注，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3页。

[2] 余新忠：《晚清“卫生”概念演变探略》，黄爱萍、黄兴涛主编：《西学与清代文化》，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554—579页。

宅卫生论》、《孩童卫生编》、《幼童卫生编》和《初学卫生编》等。光绪九年(1883年)出版的由美国传教士嘉约翰翻译的《卫生要旨》，也是介绍近代西方卫生学知识的重要著作，等等。到19世纪末，国内出现了许多以“卫生”命名的译著。在杜志章看来，在日本新术语“卫生”还未对中国产生普遍影响时，中国知识阶层通过直接参阅西方译著对现代意义的“卫生”有了一定的了解^[1]。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撰写的有关“卫生”的著述，常为后人引述的是郑观应的《中外卫生要旨》。郑观应从小接触较多西学，对西方相关卫生知识也有所了解。光绪十六年(1890年)，他在家乡养病期间编撰了《中外卫生要旨》一书。从主体上看，该著似乎仍为传统的养生学著作。不过，书中增加了不少西方的卫生知识。他说：“泰西格致日精，各西医以其格致之学考求人之脏腑、百骸，详论变硬变板不灵，各种老境皆由于土性盐类积聚所致。……西法虽精求卫生之道，全在形质上考求，不知无质生质，无形生形之妙。”^[2]这里提到的“卫生”知识虽属个人卫生范畴，与养生关系密切，但大多以近代化学和生物学等科学知识为依据。显然，这一著述已在不自觉中丰富了传统的“卫生”之涵义。稍早于郑氏，傅云龙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奉命赴日考察。期间，他参观了日本内务省之卫生局、卫生试验所。在日记中，傅云龙予以详细记载，并写下了《卫生说》：“卫与医，皆所以遂其生也，意将毋同，然而说异。医恒施于已疾，卫则在于未疾也。先是明治八年设司药，医学一端耳。十六年，易名卫生试验所。表饮食之比较，图服用之损益，固合化学、算学、医学、物理学，而自成一‘卫生学’矣。长与氏犹虑名实未符，问云龙至再。”^[3]傅氏介绍了日本的卫生行政，他这里的“卫生”已不仅仅是传统的“养生保健”。

民国初年出版的《国语辞典》中，“卫生”包括以下三个意思：1、保卫身体健康；2、研究人类生理之机能，以谋增进身体健康之学科，谓之卫生学；3、

[1] 杜志章：《论晚清民国时期“卫生”涵义的演变》，《史学月刊》2008年第10期。

[2] 郑观应：《卫生要旨》补刊《西医格致养生语录》，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0—151页。

[3] 傅云龙著，傅训成整理：《傅云龙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83页。

俗谓清洁合乎卫生之道者，如言卫生牛奶，饭菜都很卫生^[1]。民国时期出版了许多冠名“卫生”的书籍，如《初级卫生学》（广学会，1917）、俞凤宾与程瀚章《卫生要义》（商务印书馆，1930）、宋健《卫生学通论》（商务印书馆，1931）等。其中，顾秉臣在为《初级卫生学》所作“序言”中提到，“何谓卫生？即保护自己，战胜原生物之说也”^[2]。《卫生要义》一书之“导言”也写道：“卫生学，乃保持健康之学，其要旨有二：（一）在于巩固自己之体质，使各脏腑发展其适宜之本能；（二）在于杜绝传染病之侵袭，使病原微生物不得侵入我体内。”^[3]等等。可见，到了民国时期，“卫生”之内涵已经有了明显的扩展。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普澄在《江苏》发表了《卫生学概论》一文，较早对“卫生”进行了分类：“卫生学者，因人而异，宜随事而为用。……居今之世，计今之事，卫生学之为类，已不可胜数。有关系于一人者，有关系于他国者。约而分之，可为二类，曰个人卫生，曰公众卫生。个人卫生者就一人言之卫生也，因其性质之同异，更分二类，曰寻常卫生，曰特别卫生。……公众卫生者，言多人公共之卫生也。因其关系之大小，亦分二类，曰团体卫生，曰国家卫生。”^[4]民国时期，在俞凤宾、胡定安、赵士卿等人的著述中，也将卫生分为个人卫生和公众卫生。《申报》1925年登载了鹤琴的一篇短论——《讲究卫生》提到，“卫生有两种，个人保护自己身体，使毛病不会到身上来的，叫做‘个人卫生’；大家通力合作，除绝种种使人生病的东西，叫做‘公众卫生’”。^[5]赵士卿在《公众卫生之重要》一文中写道，公众卫生“为一种防止及保护行为，人类或因寒燥，受天然界及社会组织不良所致之一切损害；人类或经燥湿，饥谨，疫瘡，以及一切天然界之影响，因而损其健康，或因湫溢之居室，不洁之空气等，致有损其健康；所以根据学理，设为种种改良及预防之策划者，厥维公众卫生……以狭义言之，则在减少人民致疾之原，

[1] 《国语辞典》1947年版的删节本，原书是三十年前编纂的。1989年出版的《汉语大词典》（第三卷）中，“卫生”的涵义主要有四：（一）养生，保护生命；（二）谓谋生存；（三）保护生灵；（四）能防止疾病，有益于健康。

[2] 顾秉臣译：《初级卫生学》，上海广学会1917年版。

[3] “导言”，《卫生要义》，第1页。

[4] 普澄：《卫生学概论》，《江苏》1903年第4期，第14页。

[5] 鹤琴：《讲究卫生》，《申报》1925年3月21日第五张。

而与人民以摄卫之术”^[1]。《中国卫生杂志》1931年登载的《个人卫生与公众卫生》一文也说：“个人卫生与公众卫生二者，必须并重，方能达至真正卫生之目的”^[2]。此间出现了多部有关“公众卫生”的书籍，如黄岛晴《公众卫生学》（1928）、胡定安《胡定安公众卫生言论集》（1930）、马兼善等编《公众卫生宝鉴》（1931）等。《公众卫生宝鉴》一书写道，“个人卫生，是以个人做单位，公众卫生，却以社会的全体做单位。因此公众卫生的注意与否，不但对于个人的健康，社会的福利，可以增进；就是对于国家的强弱，民族的盛衰，也有极大的关系”^[3]。

与“公众卫生”相类似的是“公共卫生”。1910年第4期的《中西医学报》登载倜奴述《公共卫生事业之要旨》一文，是较早探讨“公共卫生”的专文。如果说，清末对此探讨寥寥无几的话，进入民国以来围绕“公共卫生”这一主题的论著可谓颇为丰富。《科学》1915年第5期登载了过探先《公共卫生浴所》一文，简要介绍了欧美各国的公共浴所，提出“吾国每当夏秋间，瘟疫交作，传染靡已。有志公益者，盖于公共卫生浴所之建设，三致意焉。”^[4]同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词源》将卫生分为个人卫生、公共卫生两类。题为“公共卫生”的著作也随之陆续问世，如胡鸿基《公共卫生概论》（1929）、赖斗岩《公共卫生概要》（1937）、毕汝刚《公共卫生学》（1946）等。胡鸿基在《公共卫生概论》一书中指出：“个人卫生，在养成个人合于生理的正当习惯，以获一己之天然健康与发育。公共卫生，在用有组织的政府机关，遏止一切病原，以护全体人民之健康，且增进其寿命及能率。公共卫生之事业，又可分为治疗医学与预防医学两大类：治疗医学，以恢复病者身体之健康，使其爽然若失，一如未病为任务。预防医学，以运用医学上种种发明，消灭病原肆虐之机会，使无从侵害健康人民为任务。”^[5]赖斗岩在其《公共卫生概要》一书中指出，“据普通人看来，医学仅事治疗疾病，卫生不外清洁环境。此种见解，未免‘坐

[1] 赵士卿：《公众卫生之重要》，《晨报六周年纪念增刊》，晨报社1924年版，第116页。

[2] 吴国栋：《个人卫生与公众卫生》，《中国卫生杂志》1931年第2年合集，第371页。

[3] 马兼善等编：《公众卫生宝鉴》，世界书局1931年版，第1页。

[4] 过探先：《杂俎·公共卫生浴所》，《科学》1915年第1卷第5期，第594—595页。

[5] 胡鸿基：《公共卫生概论》，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第4页。

井观天’，实不知其范围之大也”^[1]。该书将卫生分为医学、预防医学、治疗医学、个人卫生及公共卫生等五类。毕汝刚《公共卫生学》一书明确写道，个人卫生“在促进和保持个人之健康，以个人为主体”，公共卫生“在维护全体人民之健康，以群众为主体”^[2]。

针对“公共卫生”、“公众卫生”二者并存的现象，宋国宾在《公共不卫生》中明确指出：“公共卫生，已成为一普通名词，若干年来社会上似乎已用得很久了！其实细细加以研究，这一名词，多少有些语病，‘公共’与‘卫生’，根本就是两件极相反的事，换句话说，就是公共不卫生。……‘公共’二字是站在‘卫生’的反面的，以‘公共’与‘卫生’连合起来，无疑是冰炭同炉。吾以为此一名词，应改为‘公众卫生’，或是‘大众卫生’方能名符其实。”^[3]此文登载在《申报》上，文后所附“编者案”也赞成宋之观点：“‘公共卫生’四字，当时显由西文 Public Health 译出，然考之字义，‘Public’亦应译为‘公众’较妥之处，然凡属译名，类此小疵正多，而沿用既久戾成习惯名词，凡略闻‘公共卫生’大概者，自必知其涵义，当不致误解为愈公共即愈卫生也……”^[4]。黄贻清在《不公共亦不卫生》一文中也提到，“至于‘公共卫生’的应译作‘公众卫生’，更是我所极端主张的。这个名词，实在可叫做‘公众健康’。因为和公众健康相对待的 Hygiene 早就译做卫生或个人卫生了，所以一面就称做公众卫生。已故名医俞凤宾先生在十五六年前给申报自由谈写宣传卫生的文字，同时，我国第一个研究卫生的胡宣明先生和贻清合译世界卫生名著罗氏卫生学，却也是都用‘公众卫生’的。不过，后来一般人反习于俗名，沿用公共卫生了吧。与其说要改译，不如说该复用啦！”当然，文章也强调：“这是卫生学名词的斟酌，无关宏旨的。”^[5]郁维则在《论公共卫生与健康》一文中提到，“公共卫生”被一般编著卫生课本的作者引用，和“个

[1] 赖斗岩：《公共卫生概要》（上），中华书局 1937 年版，第 1 页。

[2] 毕汝刚：《公共卫生学》，商务印书馆 1946 年版，第 1 页。

[3] 宋国宾：《公共不卫生》，《申报》1937 年 7 月 13 日第三张。

[4] “编者案”，宋国宾：《公共不卫生》，《申报》1937 年 7 月 13 日第三张。

[5] 黄贻清：《不公共亦不卫生》，《申报》1937 年 7 月 20 日第三张。

人卫生”作对称,含糊着公众卫生的意义^[1]。公共、公众仅一字之差,但反映出“公共卫生”一词并未为时人所完全接受和认同。

无论是公共卫生,还是公众卫生,针对对象都是政府和广大民众,其目的都是为减少疾病、维护生命健康。公共卫生涉及的范围颇为广泛,对此时人亦多有分歧。陈志潜在《公共卫生是什么》一文中说:“甚么叫公共卫生——公共卫生这一名词,在中国历史上是最近十五年才有的。社会人士对于这个的了解,各说不一,有人认为公共卫生就等于街道清洁,有人认为公共卫生就是诊治疾病,甚至有人认为公共卫生就是满街贴标语散传单的卫生宣传”。在他看来,“公共卫生是以大众健康为对象,因社会团体的力量而增进人类幸福,促进医学进步的研究与设施”。^[2]吴朝仁在《公共卫生的意义与其工作》的广播演讲中指出,“公共卫生在我国是一种新的事业,所以有很多人对于他的意义、目标及工作范围尚不十分明了。有人认为公共卫生是一种慈善事业,有的认为它不过是扫除积土及洁净接到等普通工作;甚至有人以为它是学无专长的大夫护士们吃饭的一个招牌。”在他看来,“公共卫生是藉有组织的政治及社会的力量,运用各种科学及医学的知识与方法来推进民众健康,减低死亡,延长人民寿命,预防及治疗疾病的公共事业。”^[3]姚永正在《公共卫生的意义》一文中也提到,“所谓公共卫生者,就是应用这种科学及医学,一来提高人民健康,二来提高人民能率,三来实行疾病之预防。”^[4]等等。

平心而论,中国古代对环境、饮水、传染病等方面的建设并非匮乏,只是并不系统,并未把其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做。在公共卫生的建设方面,西方国家走在了前面。梅贻琳在《公共卫生之历史》演讲中介绍了公共卫生的发展历史。他把公共卫生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古代,古希腊、罗马是注重公共卫生的模范;二为黑暗时代,“环境卫生及个人卫生均大退步。但防

[1] 《中华健康杂志》1949年第6期,第1页。

[2] 《学思》1942年第2卷第8期,第2页。

[3] 吴朝仁:《公共卫生的意义与其工作》,吴骥伯等编:《卫生广播演讲集》,北平市卫生局第一卫生区事务所1937年版,第1页。

[4] 《医药评论》1929年第3期,第11页。

疫工作实萌芽于此期”；三为昌明时代。1800—1850年间，卫生事业大放光明。卫生之所以能如此进步，有赖于科学勃兴、慈善之倡导。英国1866年颁布卫生法，是第一部涉及公共卫生的法规^[1]。随后，各西方国家纷纷颁布卫生法规，创建卫生机构，推进本国的公共卫生建设。而中国，直到20世纪初年才开始创建卫生行政机构。中华民国成立以来，在政府和各民间团体的大力倡导和积极推动下，中国的公共卫生建设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一度呈现出繁荣之景观。

二、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在叩开中华帝国国门的同时，也击碎了天朝大国的迷梦。与列强军事侵略相伴的是，西方文化悄然传入中国。在西学东渐过程中，传教士担当了非常关键的角色，他们怀着各自的目的来到中国，在传教的过程中将西方的政治、经济、教育、医疗卫生等知识通过各种途径介绍给尚在懵懂状态下的中国人。在来华的传教士眼中，中国人缺乏公共卫生观念，中国是“流行疾病的源泉”。目睹此状，伯驾、德贞等一些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租界、通商口岸等地开展疾病诊治与预防工作，有的起初遭遇强烈的抵触和反对，但后来逐渐获得了当地政府和部分民众的信任。它在这个过程中涌现了一些医疗卫生组织，如中国医务传道会、上海益智书会等，其中1886年诞生的“中国博医会”被公认为中国近代医学社团的嚆矢，在传播医疗卫生知识、开展医疗救治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随着西医药的日益传入，其在疫病防治、妇婴卫生等公共卫生事业上的控制力和有效性得以显现，从而逐渐打破了中国几千年来以中医药为绝对主导的医疗卫生格局。

进入20世纪，随着西学东渐的日益深入，赴欧美留学的学生陆续学成归来，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得到了重要的发展契机。这些留学生当中不乏修习医学者，求学期间他们一方面接受医疗卫生知识，参与医学实践；另一方面也目睹了西方国家在推行公共卫生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及其经验，与中国公共卫生建设之落后、国人普遍缺乏卫生观念形成极大的反差。回国之后，

[1] 梅贻琳：《公众卫生之历史》，《新声》1930年第16期，第81—87页。

他们或参与医政,倡导创建卫生机构,颁布卫生法规;或投身教育,致力于卫生教育的普及,培养了大量的医疗卫生人才。随着民国政府“扬西抑中”卫生事业管理基调的确立、西医医疗模式的推广以及国人医疗卫生观念的变迁,西医在中国的话语权逐步确立,西医在公共卫生事业上的主导地位也逐步奠定。毋庸置疑,政府是推行公共卫生建设的主角,各国无一例外。但与此同时,一大批以推进中国公共卫生事业为己任的科学社团亦担当了重要角色,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许多方面与政府的公共卫生建设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一定程度上纠正或弥补了政府的缺陷与不足。

近代以来,随着疫病的连年流行,外人关于华人“不卫生”^[1]、“病夫”、“东亚病夫”中国形象的定位,以及国人民族主义情绪和现代民族国家建构意识的积蓄和弥漫,政治、社会精英逐渐在观念上建构起了卫生与种族、国家间的关联。他们纷纷指出,“卫生乃是强种之本”、“公共卫生与国家之盛衰,有莫大之关系”^[2],中华民族“要达到复兴的目的,应当先讲究卫生,健全自己的体格”^[3]、“把卫生事业普及到全民众,人人得到健康的身体,然后人口才可以增加,民族才可以图存”^[4]。可以说,清末民国时期,中国社会一直浸淫着这种卫生民族主义的声音或曰卫生强国的想象,以及随之而来的可能的实践。有研究者认为,“晚清的文化空间里充斥着关于卫生、身体、种族、国家的种种论述以及相应的追求卫生现代性的努力”^[5]。

笔者几年前曾尝试对中国科学社这一民国时期影响较大的科学社团进行考察,之后从宏观上就近代中国科学社团进行了粗线条的梳理和勾勒。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了许多有关民国社团的资料。在查阅资料过程中我发现,对医疗卫生知识的构建与传播,是许多科学社团的活动内容之一。中国科学社、中华学艺社等诸多科学社团,借助报刊、书籍等各种途径向国人传播了大量

[1] 参见胡成:《“不卫生”的华人形象:中外间的不同讲述——以上海公共卫生为中心的考察》,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6期。

[2] 胡鸿基:《公共卫生概论》,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第1页。

[3] 童行白:《卫生运动与民族复兴》,《卫生月刊》1934年第7期,第272页。

[4] 《卫生运动宣传纲要》,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印,1929年,第3页。

[5] 张仲民:《卫生、种族与晚清的消费文化——以报刊广告为中心的讨论》,《学术月刊》2008年第4期。

的医疗卫生知识。与综合性的科学社团相比,专门性的医疗卫生社团在这方面贡献更大,成绩也更为突出。医疗卫生社团在中国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明穆宗隆庆二年(1568年)由徐春甫在顺天府(今北京)发起的医学组织“一体堂宅仁医会”。“宅”是保存的意思,“仁”则是爱人无私之意,命名“宅仁医会”旨在“取善辅仁”。该会由客居顺天府的46位医家组成,制定了22条协会条款,“如曰诚意、曰明理、曰格致、曰恒德、曰体仁”等,皆为自律条款^[1]。戊戌变法时期诞生了许多学会组织,其中也包括医学善会(1897年,上海)、医学会(1897年,上海)、医学会(1898年,苏州)等少数的几个医学社团,但规模不大,影响较小。20世纪特别是进入民国以来,大江南北陆续出现了很多的医疗卫生社团,如中国药学会、中西医学研究会、中华医学会、神州医药总会、中华卫生学会、中华卫生教育会等。这些社团效法西方,通过发行报刊、编著书籍、组织演讲等途径致力于医疗卫生的知识传播,尝试构建公共卫生知识系谱,努力推进中国的公共卫生建设。但对于这些医疗卫生社团,前人关注极少,其大量的历史资料依然被尘封于档案馆、图书馆中,历史事迹几湮没于无闻。有鉴于此,笔者利用大量的原始资料,以公共卫生为切入点,尝试就民间科学社团与中国公共卫生之关系进行细致梳理,力求揭示民间科学社团在知识构建及卫生实践中的角色和功能。

最近数年来,“非典”、“禽流感”、“三鹿奶粉”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使得公共卫生建设一跃成为令上至政府下至社会各界关心、揪心的一个焦点话题。如何有效预防像“非典”、“禽流感”等类瘟疫的一再发生?“病从口入”,食品卫生问题如何能够得到彻底解决,中国人何时才能吃到彻底放心的食品?许多城市为了推进市政建设,大兴土木,建筑高楼大厦,却往往忽视了城市的环境卫生!时至今日,仍有许多民众缺乏卫生知识,在一些繁华都市里随处便溺、吐痰、涂鸦者仍比比皆是!在广大农村,时至今日“不干不净,吃了没病”依然是许多村民的口头禅,等等。加强中国的公共卫生建设、彻底

[1] 张大有、王尚柏:《安徽人最早创建中国的医学会——“一体堂宅仁医会”(一)》,《安徽医学》2010年第7期。又见《一体堂宅仁医会录序》,何志平等:《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